



日本中国学文萃

王晓平◎主编

「鬼」之来路

中国的假面与祭仪

〔日〕广田律子◎著

王汝澜 安小铁◎译 夏宇继◎审译



中华书局



日本中國學文庫

王晓平◎主編

「鬼」 之來路——

中國的假面與祭儀

〔日〕廣田律子◎著

王汝瀾 安小鐵◎譯 夏宇繼◎审譯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鬼”之来路:中国的假面与祭仪/(日)广田律子著;
王汝澜,安小铁译. - 北京:中华书局,2005

(日本中国学文萃)

ISBN 7-101-04748-3

I. 鬼… II. ①广…②王…③安… III. 傩戏-研究
IV. J82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4717 号

书 名 “鬼”之来路——中国的假面与祭仪

丛 书 名 日本中国学文萃

编 著 者 [日] 广田律子

译 者 王汝澜 安小铁

审 译 夏宇继

责任编辑 张 进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河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8 $\frac{3}{4}$ 插页 2 字数 203 千字

印 数 1-4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101-04748-3/K·2039

定 价 20.00 元

总 序

王晓平

日本人(包括从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迁徙到列岛的人们及其后裔),至少从我国南北朝时代便揭开了研读中国典籍的历史,而伴随中国文化进入日本所产生的一系列文化现象,诸如写经抄书、创造假名、官中讲经、发明训读、朗咏流行、设明经文章诸科博士、藏典修史等等,构成了人类文化交流史上壮观的奇景。日本人审视中国的同时,也在成就着自身。不论是出于何种目的,从广义上讲,日本人研究中国,几乎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岁月,但学界真正把研究中国的学问称为“中国学”,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

长达一千五百年以上的中国研究史,是与日本文化的开创和发展紧密联系的。尤其在近代以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完全抛开中国学术史,便没有完整的日本学术史可言。但是,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研究中国的方法和态度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尽管中国传统的考据学、文献学的影响依然存在,但与西方学术同时也与本土固有文化研究建立的联系,远比与中国同时学术的联系敏感、紧密而又牢固。不论如何,从古至今,日本学界产生了众多研究中国的大学问家和名文名著。

日本人对中国的研究与中国自身的学术研究最大的不同,就是主导这门学问的根本课题,是岛国日本如何面对大陆中国。它



2 “鬼”之来路——中国的假面与祭仪

们不仅植根于异质的文化土壤，从属于日本文化体系，反映或者作用于当时日本的包括民族主义思潮在内的各种社会思潮，在日本学界获取评价，而且根本目标在于发展日本文化。所以尽管它们有时与中国本土学问面临着同一对象，然而两者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和价值。

在世界文化走出各自分割历史阶段的今天，国外中国学与中国国学共同构成世界的学术中国观，而又各属不同的学术体系，发挥着不同的文化功能。对于我们的国学来说，国外的中国学可以说是不宜回避的“他者”，日本的中国学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

进一步说，日本中国学除了具有其他国家中国学的共性之外，还有一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离不开一个“近”字。例如，由于许多业已散佚的中国文献通过抄本或者刻本保存在日本，使得日本成为域外最重要的中国文献资料库之一；又比如日本拥有传统的阅读和训释中国文学的特殊手段等等，这给中国文献的传播和解读带来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同时，由于中日两国学术交流源远流长，日本中国学与日本学研究的关系特别紧密，也使得它在考据和比较研究这两方面，有着更多的资源和课题。

在日本，对日本古代学术文化的研究，常常不能与对中国的研究一刀两断，再加上现代学术谋求沟通的大趋势，便使得日本中国学者，例如内藤湖南、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等人的著述的影响超出了中国学的范围；另一方面，某些研究日本学的著述，例如明治时代的民俗学家、最早的环境保护运动力行者南方熊楠，有“知识巨人”、“时代代言人”之称的加藤周一，“文化功劳者”称号获得者中西进等人著述中涉及到中国学的部分，也都有一读的价值。



日本近代以来在某些研究条件或手段上不同于中国本土,日本学人多重实闻亲见,不尚空谈,长于细读深究。他们在某些领域,例如中国宗教文化、敦煌文学、中外关系史、艺术史以及中国戏曲小说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曾给中国学人以启迪。日本从奈良、平安时代起逐渐形成一些接受中国文学的热点,如《文选》、《白氏文集》、《唐诗选》、《古文真宝》等,对这些作品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和成果,对中国学者的研究有着互补互鉴的作用。这些都使得中国学者对日本中国学报以热眼。学人多以“他山之石”、“邻壁之光”来强调这种关注的借鉴意义。

与此同时,中国学术界又从很早便有了对盲目追随日本学人态度的批评。早年章太炎先生对这种态度给予的辛辣讽刺,虽不免言之有偏,却仍不失警戒之功。前辈学者对于当年那些所谓“支那通”的揭露,更不该忘记。在中国学者对日本中国学展开系统研究的时候,仍有必要反对任何形式的食而不化与人云亦云现象,强调中国学研究的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的统一,葆有学术自信和识别眼力。

今天,更要看透那些变样翻炒“中国崩溃论”与“中国威胁论”的所谓“中国通”,他们往往将历史和现实作短线连接,凭借现代媒体和出版业,朝论夕改,张大偏见,仅就学术手法而言,也实不足为训。应该说,这些人虽然不是日本中国学界的主流,但是他们头上也顶着“大牌教授”、“中国问题专家”和“社会名流”的帽子,近年来忙不迭煽乎所谓“厌中”(讨厌中国)情感,就很有些拉着舆论走的能量。

然而,不能不指出的是,我们对日本中国学研究的价值,绝不止于“借鉴”,也不应该停留在“此优彼劣”的结论上。对日本来



说,日本中国学是日本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从整体上讲,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某一时期日本人的中国观、中国形象、中日关系。日本的知识界,往往通过它们认识中国、理解中国。研究中国的专家们,以及有些并非专门研究中国的思想者写的关于中国的著述,对短期或者较长期的社会思潮,有时甚至对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都起过某种作用。言说中国的学术话语与官方话语、媒体话语及民间话语等共同营造着中国形象,而其中学术话语的影响则更为长久深远。

另一方面,对于中国学人来说,通过这些著作来了解日本文化、认识日本人、解读日本人的中国观,或许也不失为一条途径。同时,我们对日本社会文化看得越透彻,就可能对日本中国学研究得更深入。

总之,在中日文化双方不能不互相正视的今天,对待格外重视师承流派、积淀深厚、做派繁复、多变多样的日本中国学来说,草草一瞥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的是原始察终,辨源析流,叩同问异,进而学会平等地与其展开卓有成效的学术对话。既是对话,那当然不是只“知己”就行了,还必须“知彼”,而且不是一般的“知”,而是要深知熟稔。所幸我们已经有了《日本中国学史》、《日本汉学史》等专门的著述,让我们看到了日本中国学乃至国际中国学研究的广阔前景。

国际文化交流发展到今天,在人们对吸收外来文化倾注着空前热情的时代,面对别种文化发出自己的声音就显出更大的必要性。这种声音,不是自说自话,而要有往有复。因而,加强对国际中国学的研究,必然会与我们的“中国学”走向世界相联系。在这一方面,日本学界可谓先行一步。为了推进国外的日本学研究,十

多年以前,日本便建立了对外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最近又在法政大学中设立了国外日本学研究基地,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对国际日本学研究展开分析。以此反观我国知识界的一般认识,有些人多只看到那些操着怪腔怪调汉语的外国人在该国学界没成什么大气候,又爱发些对中国隔靴搔痒的议论,就轻看国际中国学研究的意义。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工作的紧迫性。

读书或可睹人。推进学术交流,化解误解误读,减少文化摩擦,出书、读书、品书与人员交流对话,是有力的两翼。我们阅读日本中国学著述的时候,如果不只停留在听他们述说什么,而进一步思考为什么会那样说,和同时期中国本土研究有哪些不同,那么,这些材料就可能演化为我们拓展本土文化研究和外国文化研究两大领域更有用的思想资源。

对于收藏在日本的中国文献,日本学者已经对文本作过比较深入的研究,但我国学者却常因为无法与原件谋面而深感遗憾。有些日本学者抱怨中国学者对日本存藏的中国文献抄本、刻本评价过低,而实际原因是这些资料一般中国学者很难看到。面对涉及各类学科的日本中国学著述,切实了解它们的最好方法无疑是阅读原著,而且是系统阅读,因为翻译有时难免会模糊两种文化的细微差异。然而,在很多有兴趣的学人还没有条件做到这一点的时候,翻译就显示着特殊的必要性。

我们选择一些篇幅不长、适于阅读的名篇名著、新人新作介绍给读者,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日本中国学的多种面孔。我们在坚持学术规范的同时,也不应排斥学术研究的个性化与多样化,这些研究和写作方法的异色,或许能帮助我们扩大眼界。

我们这套丛书,没有选择像斯波六郎所著《文选李善注所引



古文尚书考证》，或者太田次郎所著《以旧抄本为中心的白氏文集本文的研究》那样大部头的专著，它们的学术价值很高而读者面很窄。这些书很重要，等条件具备，也应该译介过来。我们先要做的，是希望读者能认识一批比较好接近的客人，也就是一批学者为非中国学专业知识分子写的书。

日本一些研究中国学的名家，很重视为一般读者写书。吉川幸次郎曾提出让学问回归大众的口号，白川静总结自己的学术生涯，也强调在孤诣独往苦苦求索的同时，要努力使学问返回到“一般”，即回报于社会。像青木正儿等人文笔之好，在学界早有定评，他们关于中国文化的学术随笔脍炙人口，几十年来一直是书店的畅销书。

我们选择的书目，除了几部新人新著外，都是“大家”写的“小书”。或侧重其保留中国文献资料的价值，或侧重对中国本土研究的补阙，或侧重于对中日关系研究的历史作用，或侧重于其在日本学界的影响。取其一点，不必求全，积少成多，不拘一格，兼顾学术性与可读性。通过这套丛书，读者便可陆续与那些久闻其名而未见其文的好友见面，共享日本中国学之景观。

译者序

夏宇继 王汝澜 安晓铁

广田律子(Hirota Ritsuko)是神奈川大学经营系及该大学研究生院历史民俗资料学研究科的教授。早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教育系,并在庆应义塾大学取得文学硕士学位。二十多年以来,她坚持选择中国民俗学·祭祀演剧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主要以中国广大南方地区为现场,对中国人的村落家族、地理环境、生产职业、民间信仰、民俗演艺、人生礼仪等展开了深入的调查研究。特别对在傩祭时上演的傩面具剧中登场的诸神之特征,如那些在民众心目中可以除灾招福的鬼神的动作特征等作了细致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成为日本在傩文化研究领域颇有影响的著名学者。

傩祭源远流长,文字记录最早见于《礼记》中的方相氏,在日本、韩国也有流传。如今,古老的傩文化依然存活于民众的现实生活之中,是东亚文化比较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中国的傩文化是历经三千多年积淀,集宗教祭祀、民俗、艺术的多元文化复合体。这种带有原始、古老文化意韵和神秘风采的艺术形态,既有极其珍贵的资料价值,亦有进行多学科学术研究的广阔空间。广田律子是如何涉猎这个中国民俗的领域的呢?

记得一位西班牙哲学家说过,人介入这个过程,证明了



灵魂的降落。而每个灵魂都会选择一个降落的方式。广田律子在大学时代和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先后被日本文部省派遣到中国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留学,在北京师范大学留学期间,她有幸师从中国民俗学泰斗钟敬文教授专攻中国民俗学·民间文学,得到了钟老的亲切指导,甚至她首次到中国农村观摩民俗的机会都是钟先生亲自促成的。中国民俗的神奇魅力深深吸引了她,于是冥冥之中,广田律子的灵魂选择了这块拂去浮尘便可见其宝贵价值的历史活化石。这位日本女学者从此爱上了中国文化,与中国民俗学结下不解之缘。而在包括傩坛、傩仪、傩神、傩舞、傩乐、傩戏、傩面具、傩符和傩坛师在内的傩文化的诸因子中,广田律子将研究范围主要集中于傩仪、傩神、傩戏、傩面具方面。为此,她先后几十次深入广袤的中国南方农村,足迹遍布贵州、江西、广西、福建、浙江、广东、湖南等省,其间,她不但切身体验到民俗学这门需用双脚走出来的科学研究的艰辛,也越发感受到了中国民俗所特有的灵动鲜活的生命力。

广田律子在学术道路上的步伐是相当稳健的。除了田野考察,为了实现与国际傩文化学术界的直接对话,她还经常参加各种国际研讨会,有时即使不能到会,她也尽量向大会提交论文,以期与各国学者保持频繁的学术交流。

通过与当地研究者的密切合作及积极参加学术活动,广田律子在科研著述方面也屡获丰收。她笔耕不辍,不仅写出十余篇资料翔实的调查报告,还结合文献并与日本的傩文化相对比,不断推出以傩文化为主、也包括部分对冥婚和说唱艺术“陈十四夫人传”的研究论文以及《中国少数民族的假面剧》(合著)、《“鬼”之来路》、《中国汉民族的假面剧》(合著)、《亚洲的假面具》等专著。



在《“鬼”之来路》中，广田律子追述了傩文化的起源、发展与传播，并通过在中国各地的调查报告介绍对这些带有所谓鬼的形象的鬼神的祭祀、信仰及其在文娱表演时出场的形态，寻找日中之鬼神比较研究的线索。她指出，中国傩祭中的鬼（即作为傩祭对象的戴假面的鬼神扮演者以及戴假面的傩戏角色的表演者）不仅单纯表示死者和祖先，并且按其性格而划分为作祟之鬼及作为鬼神为民拔除灾难之鬼。后者作为神被祭祀时，为赋予他们能够战胜灾害的形象而将其风貌表现得狰狞恐怖。

《“鬼”之来路》中所引的中文书目达二十余种之多，仅此也可以看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的傩文化研究已取得举世公认的成果，其中包括组织对十几个省、自治区进行的有关“傩文化”的田野考察，先后撰写出百余部调查报告、剧本选，以及以民俗、民间祭祀和法事活动等方面为内容的著作等。而至2000年底，仅台湾以“民俗曲艺丛书”的名义，就已出版了囊括以上内容的80种专著。这些有关傩文化、文化人类学、民俗祭礼的著作，具有相当的学术水平和珍贵的学术价值，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而广田律子教授的《“鬼”之来路》一书，在傩文化的比较研究方面，确实是起到开拓者的作用的。广田律子已从一个对人文知识有着宽泛兴趣的青年学子，逐步成为专注于探索傩文化的知名专家与学者。

广田律子有着很深的中国情结。除了亲自去中国调查研究，她还牵头建立了神奈川大学经营系与复旦大学的友好交流关系，十几年来，坚持每年组织日本学生去复旦大学短期留学，在全方位加深日本年轻人对中国了解的同时也自然地增进了他们对中国的感情；她还多次地将中国研究人员，甚至傩戏表演者请到日本参加



学术活动；包括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白庚胜、中国傩戏学研究会会长曲六乙、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勤建、江西文联舞蹈协会秘书长余大喜在内的众多研究傩戏、傩文化、文化人类学、民俗学、舞蹈学、民间文艺学等方面的学者、研究人员，都成了她的好朋友；她时常穿梭于中日两国之间，无论深入到条件多么艰苦的农村地区都从不叫苦，甚至在自己家中老人、孩子都生病的情况下，也要按照原计划义无反顾地向目的地进发。这对于一位异国女性来说，的确是一件不易的事情！她的这种敬业精神赢得了中国同行的普遍钦佩，也是自始至终激励译者完成此次《“鬼”之来路》翻译工作的动力之一。

2004年10月，广田律子代表神奈川大学 COE 课题组，率团与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合作，直驱地处湘贵边陲的麻林瑶族乡调查“盘王节”，使这项瑶族最古老而又已中断了56年的祭祖民俗活动得以恢复，也为配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发起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作出了贡献。

广田律子性格直爽，能操一口流利的汉语，因而在中国常被误以为是中国人，她对此很是高兴，连连说自己和中国就是有缘分呢！

2002年1月，在听到自己的恩师钟敬文老先生过世的噩耗时，广田律子深为悲痛，竟然不顾教学研究工作的繁忙，决意亲自赶往北京参加吊唁活动。我们推想，广田律子此举除了要表示自己的哀悼之情外，大概还是为了最后一次当面向这位桃李满天下的百岁老人，向这位被国内外誉为“中国民俗学之父”的学术巨擘表达一个外国弟子决不辜负他老人家殷殷期许，继续为自己钟情的民俗学研究事业殚精竭虑的决心吧。



在用了近一年时间翻译《“鬼”之来路》的过程中,我们就好像跟随作者作了一次民俗之旅,也得到不少感悟和感慨。如果现在我们被问及民俗学的学术意义何在,我们就会果断地回答:“为了尊重人类文化的多样性,维护人类文化生态的平衡!”因为各国各民族的民俗现象,包括民俗活动中出现的鬼神,都为人类文化多样性贡献了独特的文化基因,虽然这些看上去无一直接关乎国计民生,但其长远的文化史意义却一点也不渺小。

于是,对于《“鬼”之来路》的作者广田律子教授,对于这位已越来越为中国民俗学界熟悉的学者,我们也增添了更多的敬意!

鬼的魅力(代序)

关于“鬼”，学者们已积累了不少令人颇感兴趣的研究成果。在考虑日本与中国的鬼神世界时，我深感其魅力之无穷，并认为有必要从全东亚的视野对此加以考察。

为了观察日本有代表性的“鬼”，在立春前夕的二月三日，我访问了奈良法隆寺的西圆堂，它是被指定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寺院。傍晚五时起，修二会的结愿修法（译者注：佛教法会的终了法事）开始，有大约十位僧侣诵经，并以接受牛王印（译者注：一种护符）而告结束。其后，招鬼的钟和鼓以逐渐加快的节奏分别被敲击，播响了七次，鬼便随之出现。黑面、赤面、绿面之鬼各执铁斧、铁棒、利剑等武器，时而作研磨状，时而恣意挥举。观众则大声喝采：“这里！这里！”于是三鬼面向观众，把松明投给他们。三鬼后面，执戈的毘沙门天出现，他以戈猛刺三方，并在八角形的西圆堂正面与东西入口处，各出现三次。人们满怀感激地拿走鬼所投掷的烧剩的松明。

这个场景，可能应视为佛教驱逐三鬼的构图，然而实际上并不能仅做如此臆断。鬼分别面向三方，研磨或挥动武器，似乎以此来威吓无形之恶鬼进而消灭之。佛教把宫廷大雉纳入修二会时，毘



沙门天当是大雉中的方相氏的化身。这里的鬼，决非为毘沙门天所驱逐，不正是由它们自身来完成驱除恶鬼的任务吗？

鬼，确属狰狞可怕之物。正如法隆寺的鬼假面，都是借凸起的圆睁双目呈现的愤怒形象。这种表现足以象征它具有强力，因而能够驱逐无形的恶鬼。

在中国的雉祭中，也有许多依恃狰狞形象驱逐无形恶鬼的鬼神登场。开山、钟馗、大神、将军、雷神等就是这样的角色。其特征也是凸起怒目圆睁，也有伸着獠牙和犄角的。

在眼睛的表现上，日本与中国多少有些差异。法隆寺的鬼假面可作例证。日本的鬼假面上，黑眼球多是镂空的；而中国的鬼神假面的开眼法稍显复杂，黑眼球很少镂空，所强调的是保留着凸起的黑眼球的双目。白眼球部分则多为镂空，也有在眼边的鼻侧及下侧镂空为月牙形的。总之，所强调表现的是凸起的双目，借以驱逐无形邪灵的鬼神假面，都有怒视的双目。这一点，日本与中国是共通的。

如上所述，恶鬼、邪灵乃是无形之物。这是观察中国雉祭时的实感。在中国，被驱逐者登场之例，虽非绝无，却属罕见。这种情况，也许不宜直接套用于日本，但深感恶鬼与善鬼似乎是表里一体的。

人们畏惧无形之物，把临头的灾祸归因于无法确认其存在的强力的持有者。这种强力之持有者，无论其有名或无名，都是死于非命的。这类不幸的死者，如能随其所愿，也可转化为安定的存在，成为依赖其强力的人们的守护神。横死而不得超度的死者，被认为具有极强之力。其强力，对于俗世的人们，往往起负面作用。如果俗世之人为了安抚此类恶鬼而郑重地祭祀它，则其强力也可



转为正面作用。它就会杀灭其他恶鬼,变为守护世人的善鬼。世人并不因恶鬼之可畏就放任之,而要竭力把恶鬼变为善鬼,积极地、正面地利用其强力。

把本来畏惧的对象,拉到自己一方,使之成为完成相反任务的神。这种逆转,如合股之绳索,如 DNA 之螺旋,其表里善恶,可以实现性格之相互转换。这种观念,日本与中国是共通的。可以说,无形之物,作恶或为善,乃取决于祭祀者。

被赋予了狰狞姿态与形象的鬼神,在祭祀中登场。它们皆以愤怒的形象表现其无比的强力。原本无形的恶鬼被具体化时,也应用了这种共通的表现。

神与人接近时,作为受祭的回报,必然授福。人们也相当积极地期待着回馈。正因为它是能够满足人们心愿的神,才显示出其强大力量。其强力,有时因所受待遇不同而发挥正面的或负面的作用。所以切不可慢待诸神,即使向人们授福的神,也并非在同一时空永存,善神也要在祭祀终了时归去,因为神与人所在的世界终究是不同的。

诸神出现时,与人们交流,不仅坐享供品,还要向人们展示神力之强大。依据神的性格,神力的展示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对于作祟的无形的邪恶之物战而胜之,保一方平安。另一种是陈述吉祥之事,展示使人们如愿之各种情景。总之,可分为雉祭与预祝。从鬼神的风貌来看,都体现着雉神的性格。中国的鬼不仅代表死者、祖先,按其性格,还可分为作祟之鬼,与作为鬼神而为人除灾之鬼。作为受祭之神时,其鬼是为除灾而战的强力形象,被赋予狰狞可畏的风貌。后来在日本,此种狰狞可畏的风貌被给予了原本无形的被驱逐的恶鬼。